

张闻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¹

黄念然 李耀威²

[摘要]张闻天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突出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指导、对延安文艺大众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中国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理论创新中。其中,他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维理论构想,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践的基本理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此外,他的辩证性思维、中介性思维以及适应性思维在文艺问题中的灵活运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维方法的武库。

[关键词]张闻天 早期 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中国化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中共著名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而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方面所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尚未得到全面的清理,特别是这些思想财富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建构的巨大启发意义,学界还缺少深入的剖析与梳理。本文将集中探讨建国前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中的开拓性贡献,以期弥补学界在此一方面的研究缺憾。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现实指导

从年青时投身革命活动,到赴俄期间进行社会考察,再到长征与延安时期走上革命领导岗位,张闻天都在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自觉意识反映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中,反映在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指导上,也反映到他对延安文艺大众化工作的领导上。

1、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与一些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中国革命实践的早期中共领导人不同的是,张闻天从投身革命活动开始,就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他

¹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ZD078

² 【作者简介】:黄念然(1967—),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李耀威(1985—)讲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的《社会问题》、《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以及《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等著名文章，以及赴俄期间完成的学年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都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中国社会矛盾。在延安时期，张闻天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还亲自兼任该校编译部主任，提出并组织编译“马恩丛书”（十册），“列宁选集”（共二十卷），并在自己的窑洞里组织《资本论》学习小组，亲自给学员讲课、辅导。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的革命现实密切联系起来。

这种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也反映到张闻天的文学译介工作中。他十分注重向国内翻译介绍那些反映劳苦大众命运或者充满反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及安特列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注重其对中国读者的启蒙作用。在文艺理论方面，张闻天则高度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1921年11月18日，他因读日本平林初之辅所作的《民众艺术底理论和实际》（海晶译，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期）而深受启发，摘录一篇，以《民众艺术和社会改造》为题，发表于十一月二十日《民国日报·觉悟》“评论”栏，这充分显示了其文艺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思想。他在赴俄期间曾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自觉应用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五项公式”解释文艺创作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社会心理的关系，这为他分析与理解当时的中国文艺动向，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指导。

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张闻天，早期即以作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参与革命文学运动，这一点常常为学界所忽视。20年代早期，他发表了文艺论文《生命的跳跃》（《少年中国》1923年第4卷第7期）和《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少年中国》1924年第4卷第12期）。前文对当时文坛上的“悲观厌世的作品和似是而非的颓废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呼唤知识青年“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后文则明确支持“我们还要革命的文学”的主张。1924年四、五月间，他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旅途》以跨国“革命加爱情”的虚构方式和浪漫主义的精神确立了书写爱情与革命的新策略，即在凸显男女主人公以人格精神的独立品格去赢得爱情的自主权的同时，“用共同的叛逆性格与理想的革命诉求去彰显双方内在的情感动因”³，从而以精神的共鸣升华爱情的崇高感。这种书写方式既是“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精髓的承续，也开创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新范式，成为革命文学初放的花朵。作为《旅途》姊妹篇的《青春的梦》不仅细腻书写了知识青年的苦闷和反抗，更大胆展示了中国女性冲破牢笼的历程，对于革命话剧艺术的探索也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他的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则采用知识分子长虹在冬夜给阔别十年的母亲写信的方式，深沉再现了知识青年“冲到人生的战场”后的艰难生活经历、复杂心理过程，抒发了要为“创造人生的真意义”而去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的革命者的决心。

³ 陈思广：《在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间》，《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4期，第107页。

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首要贡献是从理论与行动方针上纠正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32年11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针对左翼文艺批评家在“文艺自由论辩”和“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对其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明确指出，那种“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他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拿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去批评艺术（如胡秋原），但同时他也不是疯狂的宗教的信徒。”⁴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左联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的不良倾向，还批评了“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左”的倾向。在他看来，文艺的大众化“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艺术的形式”，但那种认为“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⁵在该文中，张闻天对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出现的否定“五四”文学新形式的倾向也提出了反驳，认为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应当注意吸收“五四”以来的文艺新形式。这篇文章发表后，冯雪峰即按照其主要精神发表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33年第2卷第3期）一文。正是这两篇重要文章改变了左翼文坛的“关门”论调，使得多数言论能够立即从团结“同路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第三种人”。可以说，正在张闻天的指导下，“文艺自由论辩”趋于结束，“促使左翼文艺运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的与公开的方面去”⁶。左翼文坛的混战局面也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的亲自干预而停止，并成为左翼文坛克服“左”倾错误求得真正发展的一个转机。这是作为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张闻天在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后，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所作的重要调整，也是他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道路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3、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的理论指导。

在延安时期，中共发起成立的重要研究机构如中国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党建研究会等，张闻天都是主要负责人。比如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院长。该院开办三年，招生共五届，先后毕业学员达八、九百人，教学上贯彻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张闻天亲自授课、辅导，作专题报告，并组织《资本论》学习小组，不遗余力地在政治、哲学、文化诸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工作进行实际的理论指导和组织形式的建设，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在中共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到底由谁最先提出，目前在学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学界主流意见认为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由毛泽东正式提出并加以了精辟而深

⁴ 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07-310页。

⁵ 同上，第310-311页。

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86-187页。

刻的阐释。实际上，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张浩等领导人的讲话或发言都是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除极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外，更多的是使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与之统一的提法。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经过长期的酝酿的过程才提出来的，这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者叫“命题”、“原则”）的提出、应用、解读，张闻天都做出过重大的理论贡献。从1936年起，他在中央的会议和一些文章及报告中，多次对此做出了自己的阐述。比如，1936年3月，张闻天在政治局报告中引述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后，首次提出了将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观点。1936年10月，在讨论白区工作的讲话稿中，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的搬运到别一国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应该把他们的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⁷。在1937年9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在他看来，宣传教育工作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⁸。在1937年11月14日的延安陕公大礼堂举行的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张闻天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肯定了过去文化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过去“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中存在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公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和把文化团体当成“第二党”的错误倾向。报告还评价了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指出这些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贡献自然不少；可是具体的程度还不够，而且犯了“差不多”的毛病。报告指出文化界的当前任务是：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⁹在1938年7月26日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生所作的题为《论待人接物问题》讲演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要求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段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而是也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点。”¹⁰在1938年10月的一次报告中，他强调“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并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化的首要条件是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要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并且提出在教学上应“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中国），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

⁷ 同上，第382页。

⁸ 同上，第493页。

⁹ 同上，第523-524页。

¹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76页。

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¹¹在 1939 年 5 月的一次工作报告中，张闻天在其提出的改进与加强的“八项”要点中对中国化的方向、方法、方式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的阐述。1940 年 1 月 3 日，他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该指示共十条，对学习的主旨、课程的安排、教材的编印、教员的来源、学习的制度等问题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即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¹²这些材料充分显示，张闻天在各类报告、演讲中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有着极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

张闻天正是在上述这种自觉意识下去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这些讨论大都带有方向性和高屋建瓴的特点。比如在 1939 年 8 月 24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文艺问题发言指出：“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关于旧形式与民间形式中是否有艺术，我个人认为民间形式在某一方面是降低了些，但到真正创造民族的艺术，这是必经的阶段。中国艺术的提高须要深入民众中去。”¹³可以说，这些发言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中国化提供了民族化、大众化的两极，为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还就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曾发表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他强调“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门户之见”¹⁴，反对文艺工作“成为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叫喊”¹⁵，鼓励“要善于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¹⁶。他高度赞扬鲁迅“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¹⁷。1936 年 10 月 22 日他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以文艺的方法具体的表现去影响全国人民促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中明确提出了“作家要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在 1940 年 10 月 10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他又明确反对将文艺狭隘地政治化或公式化，在他看来，“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该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狭隘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的评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同时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¹⁸

二、新文化的“四维”理论构想及其重大意义

新文化的理论构想是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逐步

¹¹ 同上，第 590 页。

¹² 同上，第 625 页。

¹³ 同上，第 616-617 页。

¹⁴ 张闻天：《发展文化运动》，《张闻天文集》第 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 115 页。

¹⁵ 张闻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张闻天文集》第 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 152 页。

¹⁶ 同上，153 页。

¹⁷ 张闻天：《哀悼鲁迅》，《张闻天文集》第 2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 191 页。

¹⁸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第 638-639 页。

形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这一重要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于1940年1月5日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所作的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这一报告主要是讨论新文化建设问题的，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探索却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对新文化的性质、内容、任务与发展前途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充分显示了张闻天在系统地攻读马列原著后结合中国革命文化与文艺的具体实践的勇于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气质。报告共分十五个问题展开：（一）日本灭亡中国的奴化活动与奴化政策；（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任务；（三）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四）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五）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化；（六）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三民主义；（七）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八）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大众化问题；（九）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式问题；（十）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发展；（十一）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及其前途；（十二）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当前的具体任务；（十三）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十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十五）全力为争取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报告在论述新文化的性质时将新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特点，这四个特征的归纳与总结，不仅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艺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维度，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艺中国化问题的探讨有着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个报告同稍后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四个维度的确立与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设想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不妨来对读这两个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文本：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救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

（一）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二）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三）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真理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四）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任何一种主义，一个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五)为抗战救国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¹⁹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²⁰

从时间上看,张闻天的这个报告要早于毛泽东的《讲话》两三年之多,其开拓性意义更大。在这两个文本中,除了毛泽东将“民主的”看作是“大众的”题中应有之义外,他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体系构成、基本内容、性质等方面的理解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因为,张、毛所处的救亡图存、不断革命的紧迫现实与动荡时代为他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现实环境与时代契机,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密切联系中国新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去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在希冀构建文艺的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和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方面,以及在消解和清除旧文艺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迅速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方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坚决性、主动性和一致性。其中稍有不同的是,张闻天把建立新文化的主要使命放在“抗战救国”(毛则放在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中国)上,特别提到新文化之民主性的重要性(而毛则将之归到“大众的”之中,视其为“大众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了合并,这也为后来文艺界延宕对文艺民主性问题的讨论,也为后来“文革”期间的文艺专制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将“科学”与真理的追求联系起来(而毛则突出“科学的”的基本涵义在于“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更凸现如何追求“科学”的方法论及基本原则问题),将“大众”定位于少数特权者的对立面(而毛则将之明确定位于“工农劳苦民

¹⁹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

²⁰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709页。

众”)。但这些差别不能掩盖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平民价值观,以及都注重从社会视角与政治建构的角度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刻考察。综合起来看,这两个文本涉及的文化问题之广、之深、思考问题之全面、文化理论建构视域之广阔,都是前此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所不曾有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渐成熟的重要形态和标志性成果。现在回看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是对于文化的民族特性、民族形式、民族传统的关怀与强调,在纠正“苏维埃文化”及其所谓“国际主义”、“国际路线”所存在的非民族性、反民族化倾向中透露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科学的”强调的是“五四”启蒙文化精神,其中包含了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启蒙运动中的实绩的认可,以及对外国先进文化的巨大启蒙作用的认同;而“大众的”凸显的则是革命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完成了从苏维埃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转换,实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系统整合,弥合了传统文化、启蒙文化、革命文化之间的裂隙”并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理论纲领和文化旗帜”的话²¹,那么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同样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正基于此,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报告中也同样祖述了张闻天对新文化基本性质的理解,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²²我们也真切地看到,在随后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求过程中,文艺理论界的大多数努力及其探索都并没有超过张、毛二人的基本框架。

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维方式的创新性发展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述理论建构中,还体现在他探讨文艺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所作的创新性发展与应用上。综合起来看,这种创新性发展与应用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综合性辩证思维。即张闻天善于对文艺现象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全面的综合的辩证性的认识与考察。这一点在他对新文化性质、内容、原则、方向等问题的全面阐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关于新文化问题,张闻天对诸如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其它党派与学说的关系,文化理论与文化策略的关系,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新文化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化与三民主义文化的关系,“五四”启蒙文化与左翼革命文化的关系,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党的集中领导与作家的创作自由的关系,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形式与政治立场的关系,文艺作品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等复杂的文化与文艺内外

²¹ 周平远:《新民主主义理论创新论》,《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²² 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9-110页。

部关系问题，每每都能以辩证视镜加以综合考量，将之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中加以检验，形成了自己开放性的综合辩证思维特色。

二、中介性思维。即张闻天善于通过分析文艺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充分认识文艺活动中矛盾对立的两极的基础上，也承认矛盾对立之外存在的东西，及事物矛盾的中间状态，并注意引导其向非对立的方向转化。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对左翼文艺战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上。在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由于受党中央“左”倾思想的影响，文艺界曾出现过“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其突出表现就是否认当时中国文艺具有第三种文学或第三种人存在，将中国文坛简单区分为无产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阵营，甚至连鲁迅、茅盾等作家也被激进的革命文学家们批判。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文艺问题。张闻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性思维，对文艺战线上的这种左倾关门主义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剖析和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定”，“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他还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是我们的同盟者，对于他们要进行“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要执行“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他进一步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为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在他看来，如果排斥这种文学，骂倒或打倒这些文学家，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其实质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统一战线，最终只能使无产阶级文学陷于孤立。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文艺创作，正确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并克服自身的弱点。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性思维，张闻天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文坛现状，正确阐述了中共的文艺政策，为中共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适应性思维。即张闻天十分注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来工作方针，保证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在具体的运行中实现与客观文艺活动实际的协调一致。这不仅表现在他能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或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应对策略上（如遵义会议前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以及西安事变前后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策略的转变），也表现在他对左翼文艺实践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中。比如，他对“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出现的否定“五四”文学新形式的倾向就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1937年的《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文艺运动要适应当前抗战形势。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他明确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在他看来，“发扬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为实行他们的理想而斗争，提高他们创作与研究的积极性，关心他们创作的命运——这是发展与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方法。”

针对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也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上的某种不一致、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该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争论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不必过早做结论。对某个文化人的缺点的提出，也要经过适当的方式”。²³在1939年2月5日出席《新中华报》编辑部召集的在延安的文化人座谈会上，他就《新中华报》的改进办法明确指出：“《新中华报》以后要多方面地反映现实，文艺、歌咏、木刻、漫画、科学、哲学都可以刊登，特别在副刊上更需要有多方面的内容。”“《新中华报》过去编辑比较呆板，以后要再活泼生动的各种形式中表现我们坚定的政治立场。”²⁴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张闻天十分注重在接触实际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思考以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文艺现实，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现实的契合点，并由此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

结语

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极为丰富、生动和深刻的，既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如革命文学作品和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入阐释（如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认识以及用唯物史观考察新文化运动及其特征）；既能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学的实际相结合（如纠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反对文艺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现实实践等），也能创造性地提出文化与文艺理论体系的构想（其新文化“四化”维度的理论构想即是典型一例）；既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创新性转换（如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等），也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创新性发展（如中介性思维在文艺论争中的巧妙运用）。总之，他对于如何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如何理解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如何理解文艺形式，如何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同延安工农兵文艺的关系等诸多重要文艺问题，都作过卓有成效的理论指导。在转变领导文艺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推动戏剧与报告文学的发展，支持“文协”等文艺团体的成立和发展，历史地考察新文化运动及其特征，总结“联”的历史经验诸方面，张闻天则就如何将党的文艺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革命文艺现实有效结合起来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论的探索，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早期我党在文艺战线上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自觉意识，其历史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建设当代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²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90-1911）》，张培林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25页。

²⁴ 同上，第605页。